

■ 新闻传播

# 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初探

车 英<sup>1</sup>, 欧阳云玲<sup>2</sup>

(1.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中南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作者简介] 车 英(1954-), 男, 河北望都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和国际法学研究; 欧阳云玲(1979-), 女, 湖南湘潭人, 中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

[摘 要] 舆论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 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与道德给我国舆论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国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特性。在现阶段, 研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助于推动建构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 形成健全的舆论监督体制, 进而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关键词] 舆论; 民族特性; 大众媒介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5-0708-06

法国 18 世纪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丹纳(Taine, H)在谈到一个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舆论特征时, 将种族(追溯历史)、时代(具体环境)和制度(包括风俗)视为考察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据这种考察方法, 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而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经历了 5000 多年的风风雨雨, 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 赋予了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舆论特性。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 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 往往通过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 表现出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性格、气质、传统、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 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离不开民族文化而单独存在的。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sup>[1]</sup>(第 36 页)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 “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 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sup>[2]</sup>(第 56 页)。所以,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 正如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样, 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中国舆论也是一样, 但它不等同于西方舆论。中国舆论的形成与演进有着自己深厚底蕴的民族特性, 这种民族特性就是中国特色。

目前, 中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 由此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给人们造成了强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 电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 使人们对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消失已变得司空见惯。面对舆论的瞬息变化, 以及舆论的自发性、盲目性, 党和政府认识到需要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 以确保舆论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 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为媒体更好地实施舆论监督提供平台,

进而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 一、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 (一)自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并且渠道畅通,而自下而上的舆论相对迟缓

中国2000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强调皇权至上、等级森严以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王公贵族的特权对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了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公权的畏惧,并形成了君言民顺的惯性。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中央集权、极权专制、愚民政策、践踏天赋人权、不平等、非理性的种种愚妄,等等,成为2000年来国家管理的惟一定式或模式。因此,中国舆论基本上是围绕并维护皇权,其定式是自上而下,并且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到了近现代,封建王朝走向末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们提出了“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然而,中国没有民主传统,2000多年来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桎梏,造成了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权力和对话渠道,进而丧失对话欲望。故而,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但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振兴中华”,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并日益成为后来中国舆论思想之主流和精髓。诚然,中国始终不乏坚定的民族脊梁和进步的舆论领袖,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时,中国舆论思想之主流和精髓就显得越发突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业为重,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了统一战线。全国上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日舆论高涨,要“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始终站在抗日最前线,实行“全民动员,全民抗战”,领导着全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抵御外寇侵略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革命前贤,始终视“振兴中华”和“筑新长城”为己任,并发扬光大,以此作为中国舆论之发展方向,新闻媒体也就从一开始被定为党的喉舌和思想文化宣传工具,成为一种与政治相连的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担当的不是舆论代言人的角色,而是作为国有资产。“办报立言”、“以政论赢得读者”继续成为中国舆论“古为今用”的传统特色之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大众媒体经过拨乱反正,有了较大改观,但在“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中仍然以“上情下达”为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大的原则和方针上。大众传媒为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时,会自觉地把政府的指导方针放在第一位,为舆论提供反映主流意识的标准化意见,承担着以国家意志即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职责。而大众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信念系统对媒介提供的标准化意见普遍自发地形成定势,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的形成和意见的表达。这种固定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sup>[3]</sup>(第63页)。此固定成见形成的集体思维使大众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对表”,致使不少民众对于“说”或“说什么”及“如何说”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这样一来便很容易地形成舆论的相对一律性。诚然,舆论的一律与多元从来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两者相辅而行。关键是要把握其“度”,舆论过于多元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舆论一味一律终归使得“万马齐喑”。另外,在当今社会中,光靠自上而下、传播速度快并且渠道畅通的舆论是不够的,还要拓展自下而上的舆论,并使之快速传播和渠道通畅,这样,我国舆论才能达到均衡有序,做到良性互动。

自古以来的中国,舆论价值的评判标准往往不是舆论本身,而是取决于舆论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其实,不少“名言”都可能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膜拜的表征而已。我国大众媒介对名人的关注,对名人的“炒作”,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驱使,而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从国家领袖到社会各界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无形地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舆

论的评判标准,而不是用客观、冷静、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那么李普曼提出的要由“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的理论假设恐怕就会实现,最终在话语权上走向少数人的专政,届时就没有什么民意和真理可言了。目前,不少媒体提倡“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力图向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体回归,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语也受到关注,但总体来说,大众媒体的宠儿仍然属于各类“名人”。因此,中国舆论要体现宪政思想,要运用法律手段制衡,要向社会的主体回归,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 (二) 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民众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古时的华夏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又是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这或许就是缺乏公共精神的狭隘“自强”吧。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即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19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 20 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851 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自汉朝以来,中国历朝政府所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儒学是一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定于一尊”,“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堂所言,是“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即便是政府本身,其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一心修炼“治家”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

由此可见,公共精神的缺失,是一种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环境中,是很难培养出公共精神来的。在当代中国,曾经多次试图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树立了雷锋、王杰、焦裕禄等光辉榜样,社会状况大有改观。但有很多则采取的是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效果不理想。然而,这毕竟进步了很多。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最重要的是使民众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共环境,进而树立一个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关心国家大事,“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舆论是社会的净化器,舆论监督就是民众根据自己的意志,在法律保护下,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进行评价与监控。在信息传播方式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舆论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想象,它有时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领域”<sup>[1]</sup>(第 34 页)。因此,人际舆论相对过剩,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特别是当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或道德时,更容易引起长期的舆论发生。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德治国的国家,对周围的人和事往往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判断是非。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原则的冲击下均已受到强烈的震撼。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最恰当的描述。比如舆论长期以来对“看客文化”的谴责,当年鲁迅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至今仍然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归根到底,这仍是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综上所述,真正能否使一个国家和民族久盛不衰,往往取决于该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力,而文化又可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我国应大力弘扬先进文化而毫

不留情地破除落后文化。

### (三)重视舆论的一律性,而相对轻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舆论

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国家权力大于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的国家,追求“大一统”,重视舆论的一律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担当起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不分,市场经济不发达,未能孕育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力图重塑自身的职能形象,逐步转换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避免其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但目前的现状仍然是国家权力过强,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相对过弱,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还不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独特的国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太深,因而对不同意见和声音,特别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舆论较为轻视。

目前,伴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大一统”的一味舆论一律很难保持固有之局面。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仍然占主流话语系统的同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生活观念和方式得到追求和认可。“主旋律”之外的舆论是不一律的,但如此舆论的不一律并不代表对各种意见本身的肯定或否定。比如,文艺界近几年先后出现的倍受争议的美女作家某某和“宁当‘妓女作家’也不当‘美女作家’”的某某,以及在网络上用身体写作的某某,她们的作品以及观点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唾骂,无怪乎有学者针对目前有关文化热点话题发表言论说这“是一种文化倒退”。此时,大众媒介更要坚持舆论的正确发展方向,把握好舆论一律与多元之“度”,推行社会进步。

## 二、我国舆论民族特性形成中的缺憾因素

### (一)传统思维方式的缺憾

舆论自身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信念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里所说的信念是指人们在接触外界之前,头脑里已经存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信条、价值观,在李普曼那里称为“固定成见”。他写道:“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经有的形象”,“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sup>[3]</sup>(第77页)。所以,一种特定的舆论环境总是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如果说公众的信念系统是舆论环境相对稳定的内核,那么思维方式是形成这一内核的形成机制。”<sup>[1]</sup>(第86页)思维方式总是带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因此,分析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的民族特征,有助于对我国舆论特性的认识。

我国民族思维方式的缺憾表现为非批判的思维方式以及缺乏实证分析的精神。非批判的思维方式即惟书惟上,“只言片语的最高指示,人们竟能以洋洋万言对它作传教般的阐述,寥寥数言的经典引据,人们却连篇累牍地注释它和论证它,而不考察其本身的前提如何”<sup>[1]</sup>(第86页)。这种缺憾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农依附心理以及道德本位的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导致了人们对权力及偶像的盲目崇拜和逆来顺受。即使在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还是公众舆论的“把关人”,大众媒体普遍缺乏一种批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公众在对大众媒体进行的议程设置上依然缺乏冷静思考的姿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大众意见的汇集与趋同受媒体的影响严重,舆论多元与一律不均衡,不利于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建设。

### (二)中国民众(包括新闻工作者)公民意识的缺憾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和“言禁”“报禁”制度,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被无情剥夺和压制;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军阀专制统治和社会动乱频繁,民主化进程屡遭中断,致使公民社会资源十分匮乏,不仅没有产生系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的实践更是举步维艰,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公民意识的缺乏使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走上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开始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公民意识从总体上



有了显著提高,但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非自觉阶段”。

公民意识的缺憾大大地妨碍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论及城邦制时提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谓“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意见和思想观念自由表达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借助这一空间,民意和民智得以汇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也借助这一空间,公民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实施对政府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的监督。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进行质询和批评,监督权利部门的运行,并借此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国由于公民意识的历史性缺憾,使由大众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很难有效地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 and 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

### 三、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

#### (一)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舆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舆论是政治、政体之基础。梁启超在 1910 年 2 月 20 日发表的《国风报序列》中写道,“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谏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安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sup>[4]</sup>(第 559 页)换言之,舆论若要对民主政治有所促动,必须将自身转变和成长为健康的舆论,而健康舆论之形成,则有赖于领导者和民众之诸种心理条件。可见,研究我国国民的心理特征,探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目的地引导健康舆论的形成,以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 (二)有利于舆论监督的有效实施

“舆论监督”是一个扩大化概念,是“舆论监督”、“媒介监督”和“某种程度的媒介履行公共政治权力”的统称。从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到 2002 年党的十六大,“舆论监督”连续四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表明对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的重视。反思形成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因素,增强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意识与批判精神,使我国的舆论既是公民社会监督公权力和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同时,健全舆论监督制度,建立高层次、高水平的舆论监督体系,以保障和庇护公民私权不受非法侵蚀、限制和侵犯,进而成为维系公民社会自身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盾牌”。

#### (三)有利于大众媒介与舆论的互动

大众媒介对舆论或多或少地有着引导之功能,“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怎样想,却能告诉人们想什么”<sup>[5]</sup>(第 262 页)。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信息形态的不同表现及相应的舆论引导,是从微观层次上对不同的舆论进行不同的引导。在宏观上,舆论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性的精神状态,除了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缺陷,还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势和劣势。大众媒介如果能针对其特性进行引导,有利于舆论的理性化、多元化。舆论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合理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方面克服国民的惯性思维,多一点冷静,少一些冲动;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这样,舆论与大众媒介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

#### (四)有利于“振兴中华”和“筑新长城”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振兴中华”和“筑新长城”始终是中国舆论的民族特性之主要脉络和精髓,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多变性,这两条主要脉络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并未占据其应有位置。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我们更应该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同时,中国人更应该增强凝聚力,改造那种充满个人私利的“自强”,更大程度地变之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自强”,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足于世界之林。因此,大众媒介应以此为已任,传播先进文化,引导健康舆论,在“振兴中华”和“筑新长城”的伟大事业中起排头兵的作用。

舆论属于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表达自由范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舆论活动,但舆论学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还有待研究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研究舆论不但要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深入探讨,还应结合具体社会结构与环境,在实践层面上推动舆论学的发展,达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无论是在学理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舆论的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形态的发展具体样式、政治经济架构等制度性资源以及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同阶段的舆论有不同的形态。研究我国舆论的特性,不仅仅只停留在民族的角度,还应有多层次、多方面的视野,使舆论学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欣欣向荣。

中国舆论有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即中国特色,因此大可不必照搬西方的舆论模式,但我们应吸收其有益部分用来充实自己的体系。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时代,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国舆论要始终高扬“振兴中华”和“筑新长城”的伟大旗帜。作为我国舆论传播重要工具的大众媒介则既要讲新闻自由,又要讲新闻纪律、新闻责任和新闻道德;既要讲传播功能的特殊性,又要讲反映、影响和引导舆论的社会性;既要有新闻传播的战斗性,又要有和谐性;既要重视舆论的一律性,又要重视舆论的多元性;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达”;既要“纽带”,又要“沟通”<sup>[6]</sup>(第84-90页)。未来社会,经济愈发达,舆论愈活跃,人们愈有条件发挥聪明才智,新闻媒介理当高扬思想的旗帜。历史证明,舆论活跃、民智充足、民力强盛的社会必然会促进国家的全面繁荣富强。

### [参 考 文 献]

- [1] 孟小平.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 [2] 陈力丹.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 [3] [美]李普曼. 舆论学[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4] 梁启超. 梁启超选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5] [美]赛弗林,坦卡特. 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6] 车 英. 论大众传播与舆论监督的应有功能[J]. 武汉大学学报,1995,(6).

(责任编辑 于华东)

##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

CHE Ying<sup>1</sup>, OUYANG Yun-ling<sup>2</sup>

(1.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Hu'nan, China)

**Biographies:** CHE Ying (1954-),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Dean,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laws; OUYANG Yun-ling (1979-), female, Teache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Abstract:** Public Opinion is formed inside the ranges of cultures, nations and religions, which is of cultures and moral traditions.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moral tradition has so greatly influenced China's public opinion that it ha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 So at present, to study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 helps build the ripe public domain, form the perfect system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and als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 mass media